

表示：「貫通不同學科的種種研究聚在一處使我們看到：早在十八世紀，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巴黎，熱衷於文化傳通的不乏其人，但是，各種文化的、語言的、社會的傳通媒介却一再延緩或者限制了真正的匯合。尤其糟糕的是，公

衆輿論總是受到種種歪曲的毒害。每當要糾正這種有害的歪曲，就會被指責為違背傳統。」但是，他還是信心十足地表示，第三屆漢學國際研討會將如期舉行。

歐 美 漢 學 論 著 選 介

張 廣 達

102-103.

瑞士日內瓦大學教授
法國巴黎華夏書院創辦人

劍橋早期內陸亞洲史

D. Sinor 主編 劍橋大學出版社 1990年 x + 518 頁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Edited by Denis Sino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烏拉爾——阿爾泰學名譽教授
Denis Sinor 主編的「劍橋早期內陸亞洲史」已于去年出版。全書十五章，由十一位世界各地的出色學者執筆寫成，細目如下：

第一章 引言：內陸亞洲 (Inner Asia) 的概念
印第安那大學 Denis Sinor

第二章 地理環境
印第安那大學 Robert N. Taaffe

第三章 歷史黎明時期的內陸亞洲
蘇聯諾沃西比爾斯克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
A. P. Okladnikov

第四章 斯基泰人 (the Scythians) 和薩爾瑪提人 (the Sarmatians)
蘇聯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A. I. Melyukova

第五章 匈奴
普林斯頓大學 余英時

第六章 內陸亞洲的印歐人
威斯康辛大學 A. K. Narain

第七章 匈 (Hun) 人時期

Denis Sinor

第八章 Avars 人

Szeged 大學 Samuel Szádeczky-Kardoss

第九章 俄羅斯森林帶的民族

Rutgers 州立大學 Peter B. Golden

第十章 南俄羅斯草原的民族

Peter B. Golden

第十一章 突厥帝國的建立和瓦解

Denis Sinor

第十二章 囉鶴人

澳大利亞 Griffith 大學近代亞洲研究所
Colin Mackerras

第十三章 哈刺汗(黑汗)王朝和早期伊斯蘭教

Peter B. Golden

第十四章 早期和中古的吐蕃

印第安那大學 Helmut Hoffman

第十五章 滿洲的森林民族：契丹人和女真人

慕尼黑大學 Herbert Franke

正如以上目錄所示，經過 D. Sinor 努力而編成的這部著作概括了極其遼闊地域上的許多民族的活動史。十一位撰者都是專家或權威學者，他們分別在各自擅長的領域做出了可貴的貢獻。在浩如煙海的史學著述中，全面闡明「內陸亞洲」史的書並不多見，V. V. Barthold 于世紀之交完成的「蒙古入侵時期及其之前的突厥斯坦史」以及 Skrine 和 Ross 合寫的「亞洲的腹地」迄今仍是這方面僅

有的綜合性著作。從這一意義上說，本書被列入「劍橋史」序列之中，等於把「內陸亞洲」的歷史納入了世界歷史的框架，補上了人類史中人們並不熟悉的篇章，這一勞績值得人們感謝。

現在我們需要說明一下，為什麼在漢學論著欄目裏介紹這部「內陸亞洲」的著作。

主編 D. Sinor 在序言中指出，本書所闡述的內陸亞洲與其說是一個地理概念，勿寧說是一個文化概念。主編聲明，在某種程度上說，本書處理的是有如地緣政治學家 George Mackinder 所說的「歷史的地理樞軸」那樣的一個區域。因此，主編指出，一些嚴格說來屬於「歐洲」的民族，如匈奴人 (Huns)、阿瓦爾人 (Avars)、曷薩人 (Khasars) 等在本書中也有它們適當的地位。

對於主編 D. Sinor 在序言裏做的這一點聲明，似可略加申述如下。就地理概念而言，英語流行區時常使用 Inner Asia (內陸亞洲，或簡做內亞) 和 Central Asia (中亞) 兩個名詞來指稱這一地域。對 Inner Asia 的內涵，D. Sinor 早在他主編的 *Oriental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54, second and revised edition, Bloomington, 1970) 以及他編寫的「內陸亞洲教學大綱」 (*Inner Asia, A Syllabus*, Bloomington, third printing, 1987) 中已做過界定；在本書的引言章中說得更加明白。D. Sinor 所說的 Inner Asia 都包括哪些地區，讀者看一看本書十五章所包括的內容即可瞭然。在這裏，或許重複一下英年早逝的哈佛大學教授傅理初 (Joseph Fletcher, 1938–1984) 的意見不為多餘。按照傅理初之界定，Inner Asia 包括如下區域：哈薩克斯坦新疆北部準噶爾盆地和蒙古高原的所有平原及山間的草原地帶；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蘇聯「中亞」的沙漠與綠洲相間地帶、阿富汗；西藏高原；我國東北(滿州)森林地帶；西伯利亞苔原，至于 Central Asia，則只限于上述 Inner Asia 之中的草原地帶和沙漠綠洲相間地帶，不包括我國東北森林地帶、西藏高原和西伯利亞苔原，但納入我國的河西走廊及伊朗的呼羅珊。質言之，Inner Asia 遠遠大於 Central Asia。附帶一提，近年的趨勢是，在蘇聯語彙中，相當於 Central Asia 的 Srednyaya Aziya 一詞限於指哈薩克斯坦及中亞的幾個加盟共和國，歐美晚近的學術團體也多把 Central Asia 一詞限於指稱該地區的穆斯林加盟共和國和阿富汗。就儘可能把更廣大的亞洲地區納入世界歷史架構之中這一點而言，我們應該贊同主編把本書的內容擴及於「內陸亞洲」的這種設計，這是史學撰述中第一部這樣的著作。

然而，正如本書主編所強調的，本書處理「內陸亞洲

」更主要地是從文化的概念著眼，因此，與中西地理概念毫不相關，但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南俄草原也被列為本書的專章。

有意思的是，不論是從地理概念着眼，還是從主編強調的文化概念着眼，本書一半以上章節所敘述的民族都或多或少與中國有關。這也就是促使我們在介紹歐美漢學論著欄目裏介紹本書的原因。

匈奴一章是余英時教授執筆的。余英時教授有關漢代商業和擴張的研究早已飲譽中外 (Yü 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內陸亞洲的印歐人」一章敘述了吐火羅人、塞人和粟特人的活動，實際上，本章主要是根據印度文獻、西方古典作家 Ptolemy、Pliny、Strabo 等人的記載和漢文史籍追索了吐火羅人的活動踪跡。作者引用的語言學、錢幣學、考古學資料證實和補充了漢文文獻的記載：吐火羅人當是大月氏，貴霜王朝當主要是由西遷後的大月氏人所建立，其後寄多羅王朝 (the Kidarites) 仍與大月氏有關。通過這一章，人們可以明確地得到這樣的印象：內陸亞洲的各民族的活動，凡是有中國方面的記載為依據的，表述起來相對易于做到首尾完整，或者說，他們在歷史舞臺上的活動本末相對地易于重構。讀一下本書的匈奴章、突厥章、迴鶻章、吐蕃章、契丹和女真章更可加深這一印象。不僅如此，即便是主編舉出的嚴格屬於「歐洲的」民族，在起源上和民族名稱上也和中國方面的記載有着扯不清的瓜葛，例如，匈奴人和匈奴人、阿瓦爾和柔然人、Khasars 和隋書鐵勒傳著錄的曷薩人，在歷史上到底有什麼淵源，至今並沒有考證清楚。這些公案在本書中似乎也沒斷清。

在沒有一個人能够獨力完成這樣一部著作的情況下，主編經過努力，發揮了衆多專家的特長，終於纂成了這樣一部開創性的佳作。這部著作給人們提供了新鮮的、原來不知道的、有趣味的信息，也釐清了多年來某些撲朔迷離的情節。比如說，有關黑汗王朝的歷史，長期來包被在若明若暗的面紗之下，本書該章的執筆者採納了過去研究者如 O. Pritsak 的成果中的堅實部分，去掉了推測部分。這樣，儘管許多歷史情節仍然曖昧不明，但已做出澄清將有助于今後的探討，即為今後的探討擴清了道路。

對於一部創新的著作，人們當然不應求全責備。但是，對於學界已有的成果，讀者應該要求它在書中得到必要的反映，並在處理上儘可能做到均衡。舉例來說，本書敘述吐火羅一大月氏人的活動踪跡約占二十三頁的篇幅，但是關於和闐—塞人只佔兩頁 (173—174)，粟特—昭武九姓

胡的活動也只佔兩頁多一點(174—176)。實際上，有關這些方面的資料並不缺乏，近年來，關於和闐—塞語文書的考釋，關於粟特—昭武九姓城邦的考古學、錢幣學研究都有長足進展，有許多成果可資反映。至於居延、敦煌、吐魯番、Mug 山等地出土的簡牘、文書及文物，也沒有用來很好地驗證許多史實，書中沒有專節敍述高昌、龜茲、于闐等綠洲城邦的歷史。多種宗教曾流行於內陸亞洲，但似乎有關文化交流方面的許多重要事實均被忽視。

對於我們中國學者來說，這部著作有很大的啓示意義。中國學者可以從中察覺自己的視野能夠進一步擴及於哪些領域，也可以看到本書入選的課題忽略了什麼，中國學者在哪些方面更能發揮自己的優勢，以及為了發揮優勢而相應地補足自己的那些欠缺。

* * *

亞洲史論文選集——羅馬東方學叢書第60種

L. Petech 著 羅馬 中遠東研究所 1988年 18+ 412頁

SELECTED PAPERS ON ASIAN HISTORY. SERIES ORIENTALE ROMA LX

Luciano Petech,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8. xvii+412pp.

此書為義大利東方學家 L. Petech 的論文集，所選文章是1947年至1984年四十年間 Petech 氏在義大利及國際上著名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代表作。Petech 氏是義大利繼 G. Tucci 之後最主要的東方學界代表人物。1984年10月值他從教席上退休，義大利中遠東所同仁決定為他表揚他的學術貢獻，為他刊行本論文選集。

Petech 氏文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語言能力卓越，這使他的研究擴及於亞洲的許多文化領域。他的研究特色是跨越不同國度，得心應手地駕馭多種語言文獻，從事不同文化領域中人們從未接觸或很少探討的課題研究。本文集前11—18頁為 Petech 氏迄于1984年的著述目錄，其中論文和專著達102種之多，對 Petech 氏的研究領域勉強進行歸納，大致可歸結為西藏史、尼泊爾史、拉達克史、印度史、中國史、阿拉伯地理家、西方旅行家、傳教士、外交官的旅行考察報告的研究等方面。本文集中的「Mābd 及 Twsmt 為 sMad-bod 及染思麻考」，「漢文典籍中所記錫蘭考」，「釋道安西域記中諸國考」及「補考」，「敦煌文書藏文編年史的語彙考釋」，「黃支考」，「敦煌藏文文書 P. Tib 1267號的結構」，「桑哥傳」

等對研究中國歷史頗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Petech 退休並不告老。1990年，羅馬中遠東研究所列出了他的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uan-Sa-s 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Rome, 1990. (6) 167 pp. 列為羅馬東方學叢書第65種。

1990年，國際東方學界的許多著名人士為慶賀 Petech 氏七十五歲大壽而列出一本文集，文集的名稱列下：

Indo-Sino-Tibetica. Studi in Onore di Luciano Petech. A Collec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Petech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Birthday. ed. by Paolo Daffinà. 1990. x+443 pp.

此論文集列為 *Studi Orientali* 的第9卷。卷首有我獻詞和 Petech 小傳，然後依撰稿人姓氏的字母次序列出祝賀論文25篇。

* * *

蒙古帝國主義：1251—1259年蒙哥大汗對中國、俄國和伊斯蘭地區的政策

Th. T. Allsen 著 柏克萊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 1987年 XViii+278頁

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CIES OF THE GRANG QAN MONKE IN CHINA, 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 1251-1259.

Thomas T. Allsen,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xviii+278pp.

Th. T. Allsen 教授此書是研究蒙哥汗時期蒙古大兀魯思的專著。出版以來，受到普遍好評。

蒙哥汗在位九年，元史稱為憲宗(1251—1259)。九年時間在歷史長河中所謂短暫的一瞬。但是，值得留意的是，這一段時間是蒙古帝國版圖最大、勢力鼎盛而又未分裂的時期。在他位的短短時間內，遼闊的歐亞地域，從敍利亞到安南，從基輔到鯨海，全被納入了統一的蒙古帝國。在此期間蒙哥的許多作為，例如派遣兩個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分別經營中國和伊朗，例如1258年派兵滅 Ababids 哈里發朝，都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長時間以來，史學界却沒有一部著作專門探討蒙古帝國史上的這一重要階段。如果需要瞭解這一段時期的歷史的話，最扼要的敍述仍數多桑 (d'Ohsson) 于1834—35年刊行的「蒙古史」一書中的有關章節，雖然這已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的著作了。這一點和研究成吉思汗的盛

況恰成鮮明對比。講成吉思汗的書從十八世紀初年起可以說層出不窮，歷久彌新。茲舉其犖犖大者，如 Pétis de la Croix (1710)，宋君榮 (A. Gaubil, 1739)，Bičurin (Yakinph, 1829)，d'Ohsson (1834-1835)，F. von Erdmann (1862)，V. V. Barthold (1900-1901)，B. Ya. Vladimirtsov (1922)，F. E. A. Krause (1922)，H. Lamb (1927)，R. Strasser (1930)，C.C. Walker (1934)，F. Grenard (1935)，R. Fox (1936)，M. Prawdin (1937)，R. Grousset (1944)，P. Pelliot (1950)，此指他身後刊行的「馬可波羅註」中的成吉思汗條)，B. Spuler (1960)，J. Rousselet (1959)，M. Percheron (1962)，R.N. Webb (1967)，M. Gibson (1973)，L. Hambis (1973)，J. Abbott (1975)，L. De Hartog (1979)，P. P. Ratchnevsky (1983)，P. Adravanti (1987)，Michel Hoàng (1988) 等等。相形之下，研究蒙古帝國其他時期的著作未免過於稀少了。

不僅如此，迄今為止，有關蒙古帝國的西文著作（其實，也包括漢文、日文著作）由於種種原因，所研究的大多限於各個具體區域的蒙古統治，很多筆墨用於敍述蒙古對四鄰地區的殺伐攻掠及其向軍事佔領的轉變。無待贅言，軍事征服和佔領當然構成蒙古帝國向各個地區擴張的主要內容。但是，問題在於，原來蟄伏在蒙古高原東隅的一個並不起眼的游牧民族，何以竟如狂飆一般地崛然而起，叱咤風雲，轉眼間在歐亞內陸取得如此顯赫的武功？紀律嚴明、戰術卓越的蒙古騎兵在與其他游牧民族相拮抗中固然挾有其不容置疑的優勢，何以在對付歷來游牧民族未能徹底征服的農耕地區的國家時也能摧枯拉朽，接二連三地克服其抵抗，無往而不勝？

Allsen 教授着眼於此，在仔細考察了蒙哥汗在位期間的政治風雲之後，從蒙古帝國領導層的角度考察了整個蒙古帝國的擴張政策。作者所要尋求的答案是：蒙古人怎樣取得了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使他們能夠創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地域連接的龐大的陸基帝國（該書5—7頁）。作者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便構成了他的這一專著的主題。

蒙古汗國分為兩翼，兩翼又各自分為若干兀魯思 (ulus，份地)。這種中央大汗與分封的兀魯思體制構成了蒙古帝國結構的骨架。隨帝國的擴張，各個份地（兀魯思）的地方色彩日益加強。各份地各有自己的特徵，各兀魯思即據之以決定各自的政策。在和林、在拔都汗所在的 Sarai，在阿力麻里 (Almaliq)，在大不里士，在上都或大都，分別按蒙古、南俄草原、中亞、伊朗、中國的固有統治方式進行統治的傾向在加強。Allsen 的著作的特色就在於從整個蒙古帝國的全局着眼考察這一趨勢。

這時期，蒙古帝國及其下屬的各個兀魯思（各個女兒汗國）存在着三個層次的制度：

1. 蒙古自身起源的原有制度，這也就是 B. Ya. Vladimirtsov 在「蒙古社會制度史」中所考察的蒙古草原游牧制；

2. 從蒙古興起之前的活動於蒙古高原的各個游牧聯盟繼承來的制度；

3. 在與農耕世界交戰中從被征服國家借用來的制度。

蒙哥繼承了存在着這三個層次制度的帝國，他面臨的最大的原則性問題之一就是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分封的各個兀魯思政府之間的關係，首先是蒙哥和他的幼弟旭烈兀之間以及他與長門朮赤系的叔伯兄弟拔都之間的關係，拔都在成吉思汗家族中不僅系屬長門，而且在推戴蒙哥為大汗上有倡議首功和決定性的發言權，並且採取了種種實際行動。「蒙古入侵時期及其之前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一書的作者 V. V. Barthold 認為，拔都和蒙哥不是在名份上，而是在實際上處於平等地位。Allsen 不以為然。Allsen 認為，拔都只不過是「一般的」兀魯思的汗，很多情況表明，Sarai 還得聽命於中央，如朮赤系的財政支出受中央制約、拔都與鄰邦打交道並不全能自主，蒙哥汗命令出征伊拉克，拔都的金帳汗系諸王子必須參加等等。Allsen 認為，Barthold 過於相信了法國使節 Rubruck 居留在蒙哥汗帳旁時期留下來的證詞。Allsen 依據 Juziani 的“Tabakat-i Nasiri” 中有關蒙哥與拔都的關係的記述，則所得的結論即與 Barthold 的不同。這一問題當然還可以繼續討論，重要的是 Allsen 從整個蒙古帝國全局考察得出的意見。

作者成功地從現有的漢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俄文原始史料中爬梳出很多史實。作者也非常熟悉二手文獻。他從前人已看過何止千遍的史籍中鉤玄提要，探察出許多新的信息，作者認真研究乃中央集權化的政策，中央集權的各種手段，人口登記、稅收和徵集人力的制度，每一章都充滿了作者新穎而深刻的見地。蒙哥成功地把許多政治、行政權力集中於可汗的宮廷機構中（第113—114頁）。可汗擁有絕對權力。那裏沒有對大汗的制衡和鉗制體制。任何人不聽命——無論是個人還是一個民族，就是「叛逆」行徑，就有被肉體消滅的可能。對內對外，決定性因素是武力。大蒙古兀魯思的主要的和正常的事業就是征服（第79頁）。征服的需要構成了結合蒙古民族內部的最強勁的紐帶。

蒙哥大汗身旁由諸多民族人士構成的謀臣羣體所製定的政策是動員資源以供不斷作戰的政策。蒙古人四出征服而無往不勝，原因就在於蒙古人「能够有效地動員在他們

控制之下的地區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第7頁)。每一新被征服的地區都被迫獻出人力物力，供蒙古下一步略取新的土地。因此，蒙古人每進行一次征戰，實力都比上一階段有所增長，這使他們進行下一步的征服有着更大的保障。換言之，蒙人的軍事勝利有着滾雪球的效果。蒙哥時期蒙古的巨大擴張是靠動員原來敵人的力量，利用被征服地區的自然資源達到的。

* * *

迴鶻人的佛理頭韻詩集

Peter Zieme纂輯 柏林藏吐魯番文書叢刊第十三號
原東德柏林 科學出版社 1985年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ER TURFANTEXTE XIII

Peter Zieme, ed., Berlin: Akademie-Verlag, 1895.
247s + LXXXIX Tafeln.

吐魯番敦煌出土的迴鶻人頭韻詩—古突厥詩研究

Peter Zieme撰 布達佩斯 科學院出版社 1991年
DIE STABREX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STUDIEN ZUR ALT-
TÜRKISCHEN DICHTUNG

Peter Zieme,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o, 1991.
450pp.

古代突厥人和迴鶻人做詩，韻押在每句之首，這和漢詩押韻在每句之尾正好相反。古突厥和迴鶻的頭韻詩為數不少，這顯然是受佛教典籍中有 *gāthā* 的影響，現存的迴鶻頭韻詩不少就是漢文佛典中偈子的翻譯。自從1965年 Resid Rahmeti Arat 刊布他蒐集的古突厥詩(Eski Türk Siiri)以來，古突厥和迴鶻人的押頭韻的詩篇開始引起衆多學者的注意和興趣。研究論文一篇接着一篇，層出不窮。人們看到，不僅韻文體裁的迴鶻文佛典中有頭韻詩，即便是散文體裁的迴鶻文佛典中也嵌有大量頭韻詩或押頭韻的偈子，上舉 P. Zieme 氏的第一部著作是主要原收藏在柏林的吐魯番文書中的頭韻詩彙編和德文譯註，後一著作是對敦煌的吐魯番出土的古突厥和迴鶻頭韻詩的體裁、內容、撰者或譯者、迴鶻文藝術作品中的頭韻體詩節和頭韻詩的形態的綜合研究。

我國的大西北自古以來是多民族聚居地區，異質文化的交流具有無比豐富的內涵。迴鶻文佛典中為數不少的漢文詩、偈的存在，以及與之相應的大量迴鶻文頭韻詩就是這種文化交流的例證之一。

多年來，人們就敦煌變文的來歷一直進行着持續不衰的熱烈討論。從漢地文化傳統着眼者力圖證明變文與雜賦等等的祖禪關係。從中印文化交流着眼者則不願忽略外來因素的影響。意見分歧是學術進展中的正常現象。現在需要的是儘可能多方面蒐集史料，多種民族聚居、多種文化長年交流、互相影響的背景下考慮某些文化現象。迴鶻文佛典中散韻相間的文體的存在和廣泛流傳或許也有助於人們考察變文的源流。

* * *

古代和中古早期東突厥斯坦史綱

齊赫文斯基和李特文斯基主編 莫斯科 蘇聯科學出版社 1988年 453頁

VOSTOCHNYJ TURKESTAN V DREVNOSTI I RANNEM SREDNEVEKOV'E — OCHERKI ISTORII.

S.L. Tikhvinsky and B.A. Litvinsky, eds. Moscow: Hauka, 1988. 453pp.

此書名為東突厥斯坦史，實際名稱並不切題。在本書敘述的古代，突厥民族尚未登場；在中古早期，突厥民族開始出現於該歷史舞臺，但是本書敘述的地區尚未突厥化而得名東突厥斯坦。因此，本書的確切譯名對我們中國人來講應作「古代和中古早期西域史綱」，其涵蓋的地區是我國今天的新疆。

本書內容如下：

引言	頁 3— 16
第一章 研究史(綜述前人，特別是俄國人的研究成果)	頁 17— 82
第二章 石器時代	頁 83—135
第三章 青銅器時代	頁 136—155
第四章 早期鐵器時代	頁 156—189
第五章 希臘羅馬古典作家筆下的東突厥斯坦	頁 190—222
第六章 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後六世紀的東突厥斯坦	頁 223—296
第七章 七至十世紀東突厥斯坦史	頁 297—351
第八章 大絲綢之路	頁 352—391
引用史料及文献	頁 392—428
略語表	頁 429—431
人名索引	頁 431—438
地名索引	頁 439—450

引言之外，本書正文約 375 頁。石器、青銅器和鐵器時代的內容佔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希臘、羅馬古典作家

如 Ptolemy, Pliny, Strabo 等人有關東方以及當時某些東來者的記述約佔十分之一。剩下的篇幅敘述漢唐時期的西域史(頁223—351)和絲綢之路(頁352—391)，引用史料及文獻1166種，其中包括中文、日文、俄文和其他西文文獻。

此書無疑是迄今為止西方文獻中綜述我國新疆地區早期歷史最詳盡的一部，因而值得重視。它注意利用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初的論文和專著，雖然對中、日學者基于漢簡、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和西方學者基于和闐——塞語、吐火羅語、粟特語、迴鶻語等文書所做的研究成果吸收和利用得不足。

在史前時期，特別是從青銅器時代以來，新疆與中亞草原和綠洲地區由於地理生態環境的相似而保持着密切聯繫。由於吐火羅人、塞人的往來遷徙，同時見於中亞和新疆的兩種文化——草原文化和彩陶文化除了地方色彩之外，也具有很多共性。上古時期在我國新疆和河西走廊活動的民族西移後，它們的活動遺跡留在了今蘇聯中亞境內。蘇聯近幾十年在中亞地區進行考古發掘所獲得的顯著成就引起世人的注意，對於上述情況，跨蘇聯境的考古資料有哪些地方可資對比參證，本書提供了線索。

書中關於吐火羅語的來源問題、「原吐火羅人」的東來問題、操伊朗語支的人種——塞人在新疆地區的人種混合問題，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有所綜合論述。這也有助於我們理清頭緒繁縝的資料。

下面着重介紹一下第六、七、八章的內容。

第六章為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六世紀的西域史。本章首先列舉史料原文，以原文對比方式，分別介紹了史記和漢書有關塞人、烏孫、大月氏的記載的異同。在這裏，作者指出，史記未提塞人，也完全沒有提及塞人及烏孫、月氏的關係。可是，儘管史無明文，作者却把種屬尚未解決的烏孫列入了塞種。然後本章分三節分別敘述了公元前後塔里木盆地的政治局勢；漢朝與游牧民族即匈奴對西域的爭奪；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六世紀西域三十六國中的重要國度樓蘭、于闐、疎勒、龜茲、焉耆、高昌的簡況。

本章的樓蘭一節用了很多篇幅討論李柏文書究竟出于何地的問題，也就是李柏文書出土地點是在 LA，還是在 LK 的問題。人們知道，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文書出土地點問題，它涉及當時的西域長史的駐地何在：西域長史李柏既駐樓蘭(LA)，何以他的信却出土于位在樓蘭西南五十公里的海頭(LK)？由此進而引發樓蘭的王都何在的熱烈討論。自從1900年斯文赫定、1906年斯坦因前後分別考察樓蘭古都廢墟，並定為 LA 地點以來，人們對此並未產生疑問。1909年，日本大谷探檢隊的橘瑞超、野村榮

三郎在羅布泊地區考察，獲得了李柏文書，以後二人由喀什赴印度。野村返國，橘氏去倫敦會見斯坦因，呈示出土照片。斯氏橘氏二人認定李柏文書出土地點應是樓蘭城(LA)。這一點一直成為西方人士的說法。但是，野村氏回日本後，在1915年刊行的「西域考古圖譜」以及後來刊行的「新西域記」中則聲稱文書出自塔里木河支流某廢墟。因此，東西方就李柏文書出土地點問題自始就有兩說，1914年，我國學者王國維考釋李柏文書，看到李柏文書之一明於「月二日到此」一語的「此」字被圈去，而旁邊注上了「海頭」二字，另一文書直接寫成「月二日來到海頭」，從而確認李柏文書出土地點決非古樓蘭，其地當前涼之世實名海頭。1959年，日本學者森鹿三會晤了橘瑞超，見到了橘氏提供的當時出土照片，判定這張照片應是斯坦因於1914年再次考察羅布泊時命名的 LK 廢墟址，現在某些學者主張在李柏任長史時，長史駐地已從樓蘭(LA)遷往海頭(LK)。但是這一論點也有難以證實的地方。LK 遠離羅布泊，很難顧名思義，稱之為「海頭」，除非引入其他因素，例如求助於塔里木河水系變遷以證明當時 LK 實際傍臨水泊。顯然，以塔里木河水系，特別是庫姆河道變遷來解釋 LK 當是海頭的說法，又將引發其他的問題。人們在這裏甚至可以聯繫起來是否真有葱嶺南河的問題。本書能向廣大讀者原原本本地介紹出來這一問題的始末，有助於更多的人考慮歷史上的這一懸案。

本章有關于闐一節的敘述，涉及和闐二體錢的段落寫得翔實具體，但有關近年西方學者考釋和闐塞語文書的成果則反映得十分不足。本章另一缺陷是有關高昌的段落寫得過於簡略。自前涼以來，高昌和內地一樣，也是一些門閥大族佔統治地位，近年來，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對於高昌壁(265—362)、高昌郡(327—442)、高昌王國(443—640)以及唐朝在此建立西州都督府的歷史研究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很遺憾，本書沒有足夠的反映。附帶一提，本書第295 頁有關高昌麴氏王朝的世系和年號也應據中國學者最近幾年的考證結果稍加修正。

第七章是七至十世紀的新疆史。本章首先介紹了梵語、吐火羅語、中世波斯語、近世波斯語、粟特語、和闐、塞語等印歐語系文獻和突厥語、迴鶻語文獻，然後介紹漢藏語文書，特別是敦煌、吐魯番、龜茲、和闐等地出土文書，最後以介紹漢文正史壓尾。史料節之後敘述唐朝侵入之前的西域形勢，這是從隋煬帝遣使西行，某些求法高僧留下行紀敍起的。本章主要內容則是分四個階段論述唐朝在中亞的擴張：1. 630 年唐滅東突厥，藉武力鞏固在西域的地位；2. 640 年，藉助於突厥騎兵消滅獨立的高昌王國

; 3. 657 年，藉助于同紇和突厥的力量消滅西突厥；4. 從 657 年至八世紀中葉，唐朝奮力對抗吐蕃等，以鞏固和擴大它在西域的勢力和影響；5. 751 年怛邏斯之戰，唐軍敗績，唐朝盡失在西域的陣地。

在這裏，作者顯示了意識形態的色彩。對於兩漢時期，作者已在聲稱，「東突厥斯坦的主要領域只是短暫地，一般說來，只是名義上承認漢帝國的主權」（第 6 頁），東漢滅亡後，中國與東突厥斯坦的政治聯繫或者斷絕，或者減到了無可再少的地步。在唐代，東突厥斯坦雖然在更大程度上依附於唐廷，特別是在 630—751 年期間，但是，即使在這一時期，勿寧說唐廷依仗的也是日益頻繁的軍事政

治活動，這個地區並不是鞏固地、持久地從屬於這個中央帝國政權。

末章大絲綢之路主要敘述了西域南道北道及其支線、駝隊的商業往來。很遺憾，本章沒有對文化交流做那怕梗概性的敘述，例如，對於佛教的傳播，僅在第 379 頁上着墨兩段。

統觀第六、七、八章，第六章敍事較詳，雖然已有許多缺漏。至于第七、八章缺漏更甚，試觀第八章的敦煌一節（第 328—329），甚至重要人物的名字也列舉不全，敍述得並不勻稱。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研究獎助類第 1 種

已出版！

Soviet Dungans in 1985: Birthdays, Weddings, Funerals and Kolkhoz Life

by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 (葛維達)

本書為澳洲國立大學葛維達教授於 1985 年至蘇聯實地訪問東干族後所作之報告。書中詳述此一有中國血統的蘇聯少數民族之生活情況，尤其注重對兒童誕日、婚禮、喪儀，與集體農莊之描述。對東干族這個回教民族從中國甘肅、陝西一帶遷移至俄國的歷史，亦有扼要敍述。

出 版 民國 80 年 (1991) 6 月
訂 購 1 臺灣地區每冊新臺幣 200 元 Taiwan area NT\$200 per copy
2 其他地區每冊美金 15 元 (含郵費) Other areas US\$15 per copy
(postage included)